

新时代人文经济的三重伦理阐释

龚天平, 吴银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3)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两个文明相协调在新时代人文经济中集中体现为经济与人文融合发展。从伦理学视角来看, 人文与经济融合发展集中体现为伦理与经济融合发展。这就使得新时代人文经济体现出以下伦理含义: 首先, 人文就意味着以人为本, 满足人的需要。新时代人文经济既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 也以人文性、道德性来满足人的精神需要, 因而新时代人文经济具有满足人的双重需要的伦理取向。其次, 人文就意味着承担对人的责任。新时代人文经济既坚持为人民负责, 也坚持为未来负责, 因而新时代人文经济以担当对人的责任为伦理选择。最后, 人文就意味着社会公平公正、文明程度高。新时代人文经济既基于市场经济追求高效率, 为促进社会公平奠定基础, 致力于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 又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价值旨归。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质上就意味着社会公平, 因而新时代人文经济以促进社会公平为伦理诉求。阐释新时代人文经济的伦理含义, 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新时代人文经济的内在本质, 有效促进人文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关键词: 新时代人文经济; 双重需要; 伦理责任; 社会公平

中图分类号: B82-05; F29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6)01-0010-10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推动人文经济蓬勃发展是学界正在热烈讨论的重要问题, 迄今已取得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成果。人文经济学与人文经济是两位一体的关系, 前者是后者的学理表达, 后者是前者的实践形态。到目前为止, 学界对人文经济的论述大多是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角度进行的。我们认为, 从伦理学视角来理解人文和人文经济也是必要的, 这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人文经济内在本质的认识, 以伦理道德赋能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 厚植其伦理正当性, 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人文经济”一词, 从结构上看, 是由“人文”和“经济”两个词语构成的, 意在以前者修饰后者。因此, 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人文的经济”“人文方式的经济”“人文性质的经济”“人文主义的经济”^[1], 是以人文价值为牵引、具有丰厚人文底蕴的经济。如果将经济理解为市场经济体制, 那么新时代人文经济就是具有人文精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学者将人文经济界定为: “通过人文(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作用、相互融合以创造、转化并实现价值, 满足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的经济形态。”^[2]新时代人文经济的发展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后者又集中体现为经济与人文融合发展。一般来说, 人文即“文化体现的是一种道德观和价值观, 人文与经济的融合体现在以道德观和价值观涵养人, 即以文化人”^[3]。这意味着, 人文集中体现为伦理, 人文与经济的融合发展也集中体现为伦理与经济的融合发展。樊浩指出, 人文与经济的关系“在西方是宗教与经济的关系, 在中国以伦理与经济关系为问题意识和话语表达”^[4]。在此意义上, 从伦理学视角来考察新时代人文经济, 就是要阐释人文经济所内蕴的伦理道德含义。有

收稿日期: 2025-04-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偏好理论与美好生活实现的伦理学研究”(21BZX023)

作者简介: 龚天平, 男, 湖北公安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经济和企业伦理学, 联系邮箱: tpgd6812@126.com; 吴银霞, 女, 湖北长阳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 经济伦理学

鉴于此, 本文试图从满足人的双重需要、担当对人的责任、促进社会公平三个方面来阐释新时代人文经济的伦理内涵。有必要指出的是, 新时代人文经济的伦理内涵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 不可能通过一篇论文全面展示, 因此本文仅选取上述三个维度来作出分析。

一、满足人的双重需要: 新时代人文经济的伦理取向

所谓人文, 从伦理学视角来理解, 是指以人为本, 尊重人的价值, 满足人的需要, 关心人的利益。因而人文经济就意味着以人文精神驱动经济发展, 以经济发展满足人的需要。新时代人文经济坚持以人为本来发展经济, 通过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即双重需要)而成为真正的人文经济。满足人的双重需要构成新时代人文经济的伦理取向。

“需要”是一个在许多学科中都具有基础性地位的范畴。莱恩·多亚尔、伊恩·高夫将其总结为两种意义: 一是“经常被用来表示一种驱动力或产生驱动力的某种内在状态……指的是一种动机力量, 这种力量是由于特定的缺乏在体内产生的不平衡或紧张状态造成的”^{[5](46-47)}; 二是被用于描绘某一特定目标, 而这种特定目标在人与人之间是可以得到共同认可的。因此, 需要不同于想要, 后者一般是指来源于特定个体特殊偏好的满足物, 但特定个体又是受文化环境影响的, 因此想要在不同的人那里表现不同; 而前者尽管也以生理上的感性欲望为表现形式, 但人与人的感性欲望具有共通性, 因而可以普遍化。然而, 在某些特定时候, 想要也以目标的形式呈现, 那么我们又依据怎样的标准来判断哪些目标具有可通约性、普遍性呢? 莱恩·多亚尔、伊恩·高夫说: “确定谁具有普遍性基于这样一种信念: 如果需要不能通过一种适当的‘满足物’得到满足, 那么将会导致某种明确、客观的严重伤害。因此, 不努力满足需要将被视为危害相关个人的客观利益, 因此也被看成是不正常和不自然的。”^{[5](51-52)}因此, 在某一目标只是作为想要而不被视为需要时, 乃是由于这一目标不具有可通约性, 其他人与拥有想要的人难以取得共同认可。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 需要是一切生命物体(包括人和动物)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的反映, 这种反映乃是由于主体对外部环境的缺乏所导致的, 它以生命物体对外部环境的摄取为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特性或机能, 需要为生命物体共同具有; 作为一种内在动力, 需要推动着生命物体去从事各种活动。但是, 它在人和其他生命物体之间具有本质上的区别。人的需要因受意识支配而表现出能动性, 而动物的需要只是表现为动物的本能反应; 动物需要的产生和满足方式仅限于其作为生命物体的新陈代谢和无意识地、消极被动地向外界摄取, 人的需要则主要是通过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和社会实践活动创造的成果来满足的。

如果上述理解成立, 那么哲学意义上的需要就可以这样表述: 需要即人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而产生的一种摄取状态, 是人对于外部环境的依赖性的反映, 也是人具有择取、享用能力的体现。需要可以根据不同标准作不同种类的划分, 许多学者都作过这方面的论述, 此处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 人的需要分为生存需要、发展需要、享受需要。本文则根据论述所需, 将需要分为两大类, 即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样划分是有依据的, 比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五层次(即生理、安全、爱、尊重、自我实现)论就是如此, 其“前两种应该是物质需要, 后三种是精神需要”^[6]。这两种需要我们统称为双重需要。

对于人文经济而言, 经济发展要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就要注重人的需要, 而人的需要首先表现为物质需要。人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人类生存所需的生产资料源于物质世界, 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是物质性活动, 因而人具有物质性, 或称之为自然属性。而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人具有物质需要, 且物质需要是人作为生物有机体的肉体存在物的第一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说: “当人们还不

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7]只有保障人的物质需要,才能保障人的肉体性存在,这是人得以存在的前提,否则人之为人就失去了基础性条件。而人的物质性满足除了自然界提供的纯粹自然物之外,还需要部分人化的物质产品,因为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更是社会存在物。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建立在物的全面丰富的基础上,物的全面丰富又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因为人的物质需要的对象绝大部分是通过人的经济活动创造出来,并通过一定的经济关系进入消费领域”^[8],最终实现对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新时代人文经济也是人文经济的一种形态,同样以经济性为基本特性。而经济性也意味着新时代人文经济能够通过理性计算、科技创新、文化交融,助力社会生产的快速增长,促进物的全面丰富,持续满足人的物质需要。

但是,与一般的经济特别是以物为本的市场经济不同的是,新时代人文经济的经济性受制于人文性的规约。也就是说,它在追求物的全面丰富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时,其目的是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物质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9]“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归宿,人的发展以精神文化为内核。”^[9]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包括物质需要,也包括精神需要。这就意味着,新时代人文经济虽然具有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为目的的经济性,但这种经济性是受人文性引导的经济性,在人文性的牵引下,它能够以人文性、道德性来满足人的精神需要。

精神文化是人所具有的潜在的、丰富的需要(即精神需要)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展现,精神需要则是随着人的需要的发展而凸显的不同于自然需要的需要。人的精神需要有两个层面:一是自由,二是道德。前者表明,人被自由所界定,但自由又不是漫无边际的,如果自由无界,就一定会对人际关系及其他各种社会关系造成破坏。这就意味着,自由还需要理性来审视并加以规约、引导,而道德是理性的主要构成部分,因而人还要讲道德,这就导致道德成为人的精神需要的第二个层面。正是因为人有道德需要,所以人是伦理的动物。从这一角度看,满足人的需要不仅是对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更是对人的精神需要特别是道德需要的满足。以道德为核心价值的伦理是人的精神需要的重要方面,伦理与人文不是相互脱离而是相互确证的,它们都从价值层面反映着人的精神需要。在此意义上,道德需要构成人文性的核心内容。然而,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表明,经济与人文、伦理常常失衡,即经济发展只为实物的增长,而与人文、伦理的发展无关。比如,美国著名管理思想家乌麦尔·哈克就批评道:“20世纪的企业生产的是物:通过产品和服务为人们提供经济上的好处或短期的便利。”^{[10](144)}21世纪的企业则不应继续如此,而是要“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通过一整套产品和服务让大众、社区、社会、自然界及后代拥有更好的未来,为人们带来积极、切实的结果”^{[10](144)}。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曾提出嵌入性理论,他认为,经济活动并不外在于社会而独存,而是受到社会关系、文化传统和制度基础的深刻影响;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中也强调,经济行为并非完全受市场机制或理性选择驱动,而是嵌入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受到其社会关系的约束和影响。而文化传统和社会关系就包括伦理道德。

作为一种受人文价值牵引的经济形态,新时代人文经济的基础是经济性,除了能够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外,它还兼具人文性与道德性。所谓人文性与道德性,即意味着经济发展除了表现出对人的物质利益的关心与尊重外,还传递着对人性、文化、伦理道德的重视。从这种意义上说,新时代人文经济的人文性与道德性实则表现为经济与文化、伦理道德的融合发展,是对经济与文化、伦理道德的有效整合。比如,杭州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坚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率先实施《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断健全对道德模范及先进典型的关爱礼遇机制,进一步深

化新时代文明实践体系建设, 全面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一体发展, 以实现文以润心、德以化人的人文经济^[11]; 再如, 随着改革开放和融入经济全球化, 苏州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被激活并与现代文明交融, 形成了崇文致远、求精务实、开放包容、心系天下的人文精神结构, 特别是“在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下, 苏州市场的参与者得以保持社会纽带, 融入吴文化, 构建普遍信任, 成为市场契约基础。市场的发展也促使契约精神成为苏州文化的一部分, 重商文化带来优越的市场秩序和诚实守信的商业氛围”^{[12](17)}, 形成经济发达与文化繁荣共同呈现的人文经济的苏州样板。因此, 与人文性缺失的西方市场经济不同, 新时代人文经济是以人文性与道德性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 为人成为完整的人奠定坚实精神基础的人文经济。

二、担当对人的责任: 新时代人文经济的伦理选择

所谓人文, 从伦理学视角来理解, 不仅包括关心、顾及人, 而且还需要为人担责。因而人文经济也就意味着经济发展是为了人, 即要承担起对人的责任的经济。新时代人文经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为人民负责, 为未来负责, 从而成为真正的人文经济。担当对人的责任是新时代人文经济的伦理选择。

“责任”一词, 拉丁文词根是“respondo”, 本意指“我作答”, 即允许一件事情对另一件事情的回应、答复。责任担当主要是指行为者为其行为及后果承担责任。汉语中的“责任担当”有两层含义: 一是为分内应做之事担当责任; 二是因没有做好分内应做之事而为过失担当责任。伦理学意义上的责任担当, 也从这一意义上演绎而来。从内容上看, 责任担当包括许多种类, 如对经济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等的担当。其中, 道德责任担当意味着: 一是对应尽道德责任的担当, 即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在一定道德意识支配下, 对关心、顾及他人、团体、社会的责任的自觉担负; 二是对应负道德责任的担当, 即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对自己行为的过失及其不良后果在道义上的承担。相较于其他责任担当, 道德责任担当是社会对行为者及其行为的伦理期待, 是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对道德责任的自觉自愿承担和履行。当然, 道德责任担当也有一定的强制性, 比如社会舆论的要求, 但主要还是依靠个人或团体的自觉性。而其他责任担当则主要依靠强制手段才能落实。当然, 其他责任担当也需要一定程度的自觉性, 但主要还是建立在强制性的基础上。因而, 所谓责任担当, 是指行为者及其行为对他人、对社会各方面责任的担当, 其中也包括道义上的责任担当。

谈到责任担当, 不能不谈到当代著名责任伦理大师汉斯·约纳思提出的技术时代的责任伦理。他认为, 技术时代的责任伦理是技术迅猛发展且拥有了宰制性能力之时代的重要伦理形态。这种责任伦理的特点在于: 一是未来性。责任伦理是一种“远距离伦理”, 即时间上既指向当代人, 也指向未来人, 当代人和未来人都是道德顾及的对象; 空间上既指向人类, 也指向大自然, 保护人类和大自然都成为我们的义务。二是整体性。责任伦理是一种“整体性伦理”。约纳思认为, 现代社会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巨型系统, 它不仅拥有“设计与创新、生产与服务、交换与消费等领域”^[13]组成的复杂结构, 也拥有运行上的复杂过程, 因而个人行为在其中只具有极为有限、狭窄的空间。“我们每个人所做的, 与整个社会的行为整体相比, 可以说是零, 谁也无法对事物的变化发展起本质性的作用。当代世界出现的大量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讲, 是个体性的伦理所无法把握的, ‘我’将被‘我们’、整体及作为整体的高级行为主体所取代, 决策与行为将‘成为集体政治的事情’。”^[13]这样看来, 责任伦理试图揭示的义务或责任并非针对个体而言的, 而是针对作为当下政治社会整体的那种行为主体而言的, 因而是以整体性伦理的样态呈现的。

责任担当落实在经济上, 就意味着经济发展要对人承担责任。任何一种经济发展, 如果只是以物质利益为目的, 而不主动承担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 很难说是有意义的发展。人文经济作为一种人的

经济,其最终目的是人的终极发展,这意味着人文经济担当的是“人”的责任,而不只是“物”的责任,是如何使经济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人的责任。依据约纳思“整体性”责任伦理,这种责任的主体是整个经济发展活动,经济发展活动也是人的活动,受人的意识和价值观支配,因而经济发展活动也可以作为责任主体。这样看来,所有人文经济的参与者都是责任主体,责任担当者并不单独地确立为某一个体、某一企业、某一平台、某一政府机构。新时代人文经济发生于中国式现代化场域,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因而这三者是高度统一的。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其中的人是且仅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现代化的强有力的主体力量,才是现代化内生动力的根本源泉。“一个国家当中的民众对于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期待程度、参与程度和投入程度如何,一个国家当中的民众是否具有一种勤奋的工作精神,直接影响到该国现代化的内生动力能否得以充分的形成、激活和释放。”^[14]而人民参与现代化的动力又来自其利益诉求,因而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质就是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5]

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人文经济的发展要以服务人民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落脚点,要为人民负责。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从根本上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因此,为人民负责是一个必然的价值立场。人民是一个由数量众多的个体所组成的整体,因而经济发展活动对人民承担的责任是整体责任。具体来说,就是要把经济活动与人的价值有机统一起来,注重物质发展与精神发展的协调一致,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人的幸福感为价值圭臬。国务院总理李强在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服务于民生,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投资于人既是对人的投资,也是对未来的投资,投的是当下,赢的是未来;既是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力量,也是要促进人的发展,保障人的权益,因而投资于人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贯彻,也是人文经济为人民负责之理念的具象化呈现。当然,投资于人并不排斥投资于物,而是要实现“见物更见人”,使“见物”与“见人”有机统一起来,通过物的积累为人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要紧密结合。同时,就社会角度而言,人文经济通过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来增进民生福祉,因而担当着减少社会不平等、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的责任,这也是人文经济为人民负责之本性的彰显。比如,江南企业家群体不仅“积极投身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等一系列国家战略总体部署之中”,同时又“崇文重教,兴办教育,以培养人才为己任,布德行义、义利兼顾、热心公益、乐善好施、造福乡梓”^{[16](210)},充分体现了江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人文经济为人民负责的价值追求。

按照约纳思的看法,当代责任主要表现为未来责任。这种未来责任从根本意义上说也是通过环境保护而对人承担责任,是给人的未来生存和发展提供希望的责任。应该说,市场经济也是具有责任性的经济,其责任就在于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满足人们需求、增加社会财富、促进国际贸易等,来深刻影响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进步。依托于市场经济的人文经济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纯粹由科学、技术理性主导的市场经济无法总是满足人类社会的发展需求,甚至出现反噬人类利益的现象,例如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由于我们的技术立场,我们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然,与自然的关系变得异化,越是强加意志,异化就越严重,陷入恶性循环。”^[17]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对当前的社会构成挑战,更会对未来世界产生因果影响,“所谓对未来世界的因果影响,表现在我们正在为后代留下一个过度滥用的环境和过度改变的世界,有关当代人类行为后果的科学信息的不确定性,使得未来人类置身于一种损害强度难以预估的风险之中”^[18]。而新时代人文经济是一种人文赋能经济

的新经济形态, 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强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利用性、保护性统一, 这是以一种前瞻性的眼光和主动性姿态积极承担起对未来社会的责任。

未来责任是由环境保护作为中介的指向人的责任, 其践履与中国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时代人文经济的发展实质上是同一个历史过程。而“当代中国, 无论是生态文明建设政策及其理论话语, 还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政策及其话语, 都要归结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更高位阶、更为根本的科学理论体系”^[19]。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于未来责任有着极为丰富的论述。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20](7)}在2014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 他又本着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强调: “森林是我们从祖宗继承来的, 要留传给子孙后代, 上对得起祖宗, 下对得起子孙。”“必须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为子孙后代留下美丽家园, 让历史的春秋之笔为当代中国人留下正能量的记录。”^[21]在其他场合, 他多次郑重指出, “在生态环境保护上, 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 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20](12)}, “对突破三条红线、仍然沿用粗放增长模式、吃祖宗饭砸子孙碗的事, 绝对不能再干, 绝对不允许再干”^[22], “要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绿色价值观念, 让天蓝地绿水清深入人心, 形成深刻的人文情怀”^[23]。比如, “十年来, 中国重点城市PM2.5平均浓度下降57%。2022年,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86.5%, 中国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最多的国家; 全国累计造林10.2亿亩, 森林覆盖率达到24.02%, 为全球贡献了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 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快最多的国家; 中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提高23.8个百分点, 2022年达到87.9%, 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经过顽强努力, 中国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24]。再如, 作为“两山”理论的发源地, 浙江省安吉县余村从透支环境资源的矿山经济成功转型为绿色共富的生态经济, 并以做大生态优势为导向, 以生态旅游为基础, 逐渐形成“旅游+”的新兴业态。2020年3月, 习近平总书记重访余村, 看到村里的变化后欣慰地说: “余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 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 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25]2021年, 余村成功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选的“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余村的蝶变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生动诠释, 其发展逻辑超越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短期利益效应, 彰显出对未来责任的主动担当, 将新时代人文经济通过雄辩的事实证成为具有担当对人的责任之伦理选择的经济。

三、促进社会公平: 新时代人文经济的伦理诉求

所谓人文, 从伦理学视角来看, 也体现为社会公平公正、文明程度高。因而人文经济也就意味着经济发展既有效率也促进公平, 是公平与效率平衡的经济。新时代人文经济将经济效率、社会公平、人文关怀集于一身, 既注重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提高效率, 从而为社会公平奠定基础, 同时又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来促进公平, 从而成为真正的人文经济。促进社会公平是新时代人文经济的伦理诉求。

公平、公正、正义, 都是古老的伦理学范畴, 它们在含义和不同领域的使用上确实有些差别, 但如果我们不过分拘泥于此, 一般可以将其理解为“免除任意、得所应得、不偏不倚”^[26]。根据行文的需要, 本文统一使用“公平”一词。公平具有不同的类别, 人们一般将其分为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 或者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其中程序公平属于形式公平, 结果公平属于实质公平; 程序公平与结果公平相对应, 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相对应。

在林林总总的关于公平的论述中, 罗尔斯提出的“作为公平的正义”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他

看来,公平正义“总是表示着某种平等”^[27]。这意味着,平等构成公平的基本规定。罗尔斯认为,在“无知之幕”的背后,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都会选择他所设计的社会正义原则,但这一正义原则包含着一个基本精神,即所有的社会“基本善”都应平等分配,除非不平等分配对最不利者有利。那么,哪些东西可称之为“基本善”呢?在罗尔斯那里,“基本善”是指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在各种条件下的迁居自由和职业选择自由,政府官职和社会职位,收入和财富,自尊的社会基础。“这些社会基础包括诸如公民拥有平等的基本权利这样的制度性事实,也包括对这一事实的公共承认,还包括每个人都赞成差别原则,而差别原则本身是互惠性的一种形式。”^[28]显然,罗尔斯的“基本善”就是社会公共品。这就意味着,所谓公平就是社会公共品要在所有社会成员中不偏不倚地分配,而不能不合情理地差异化对待,以使分配达致协调、均衡、适宜。那么,不平等分配是否可以?这在罗尔斯那里是允许的,但要满足一个条件,即这种不平等处置要有利于最弱势者。这样看来,在罗尔斯那里,“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基本精神其实就是平等地顾及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应该说,这是分配公平理论的一种典型形态,也是对公平内涵的极有说服力的界定。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看来,公平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以现实为立足点的具体存在。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认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29]。这表明,公平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不同的社会性质、生产方式产生不同的公平观,因而公平是具体的、历史的、相对的。公平不过是对人们经济关系和财产关系状况的反映。如果这种状况合理、恰当,就是公平的,否则,就是不公平的。与受制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只有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公平不同,社会主义的公平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基础上,是普遍惠及所有社会成员的实质公平,是权利平等、机会均等、规则公正、结果均衡的有机统一。

具体到人文经济上来谈社会公平,社会公平首先意味着它要从人文经济那里获得支撑。人文经济促进社会公平又意味着经济发展要基于市场经济追求高效率,从而为社会公平奠定基础。新时代人文经济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的,高效率是其基本追求。众所周知,在人类创造的经济体制中,最有效率的首推市场经济。英国学者约翰·米德克罗夫特说:“市场导致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并因此创造出任何其他的经济制度都无法企及的物质繁荣水平。”^[30]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新时代人文经济主要通过高科技创新来提升效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在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科技创新能力越强,人文经济就越能高质量发展。但是,创新的科技又并不停留于一般意义上的科技,虽然一般意义上的科技对人文经济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但真正使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是高科技创新,特别是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创新。新时代人文经济本身就拥有一种机制,即能够有机融合人文与科技,促进人文与科技双向流转,实现科技人文化、人文科技化。这样一种机制能够形成人文新质生产力,有效促进效率提升。在此意义上,新时代人文经济是依托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机整合科技、人文、效率的经济形态。

但是,新时代人文经济既注重高效率,也注重促进社会公平。效率与公平都是其孜孜以求的基本价值目标,而不是只倚重一方,忽视另一方,使两者失去平衡,既不是因为效率而伤害公平,也不因为公平而损害效率。当然,在实际的人文经济发展中,公平与效率总是相冲突的,在一定条件下,两者的冲突还特别激烈,因而两者的平衡只能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相对的过程。当两者冲突时,社会就不能不有所侧重和选择。正如阿瑟·奥肯所言:“如果平等和效率双方都有价值,而且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那么在它们冲突的方面,就应该达成妥协。这时,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

平等, 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31]即要在两者的对立和冲突中寻求动态平衡。比如, 苏州人文经济既反映了市场经济致力于追求效率的普遍特征, 也深植于丰富的人文传统, 人文传统中又蕴含着一个核心理念, 这就是社会公平与正义。具体来说, 就是“重视在市场经济中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等手段缩小贫富差距, 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人文市场经济”^{[12][24]}。这就意味着, 新时代人文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 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它一方面并不排斥资本、效率, 相反还鼓励生产且重视效率; 另一方面又以公平为引领。这样, 新时代人文经济就成为既追求高效率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又以促进公平为伦理诉求的经济。

同时,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有其深刻内涵, 首先是指全面的富裕, 它“并非仅仅是指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富裕, 而是包括丰富多彩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以及宜人的生态环境”^[32], 其实质是经济生活上共同富裕, 非经济生活上也共同富裕。任何社会都是一个由无数个人、群体, 无数环节、层面、成分等所构成的共同体, 而且个人和群体, 环节、层面、成分等都是有机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其中任何一方面的缺失或运转不畅, 都会导致共同体瓦解或失衡。因此, 社会共同体追求富裕的行动就不能只关注经济生活的富裕或繁荣而对其他生活视若无睹。与西方式现代化由资本逻辑导致的经济生活与非经济生活关系异化从而陷入深度危机截然不同的是, 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环境等全方位的现代化, 是经济生活共同富裕、非经济生活也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非经济生活共同富裕主要表现为人民在日益增长的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生活上共同富裕。这就意味着, 促进经济生活和非经济生活共同富裕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同一个历史进程。

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新时代人文经济的关系来看, 新时代人文经济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价值旨归。“‘共同’的富裕是指社会各个群体相互间的互惠互利、普遍受益, 而不是指少数人的富裕, 更不是指建立在多数人利益受损之上的少数人富裕。”^[32]这就意味着, 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共同”, 正是这种含有差别的共同体现出公平性。所谓差别性, 是指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也不是同步富裕, 而是指时间上有渐进性、步骤性、阶段性, 空间上有地域区别性、人群区别性。所谓公平性, 是指共同富裕主要体现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这恰恰是要从分配意义上保证利益分配能够普遍惠及所有社会成员。2025年3月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对于江苏为共同富裕作示范再一次提出殷切希望: “经济大省发展得快一些, 理应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积极探索经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江苏要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方面持续用力, 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 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33]这既是对江苏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肯定, 也是对人文经济要发展为促进社会公平之经济形态的期待。事实上, 人文经济非常发达的苏南地区一直就浸润于集体富裕的文化, “这种文化如今演进为共同富裕文化。在共同富裕文化的影响下, 苏南地区推动共同富裕的途径除了发展经济扩大就业面以外, 还有富起来的群体采取多种方式助学助困, 提供本地区居民都能享受的各种公共服务, 造福乡梓。因此这个地区是国内最为富裕、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16][21]}。富裕且差距最小就体现出共同富裕的普惠性。公平性还体现为均衡性与可及性。均衡性与可及性高就表明共同富裕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公平的共同富裕。因此, 人文经济、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公平三者是密切关联、三位一体的。没有共同富裕就谈不上促进社会公平, 不能促进社会公平也不可能发展出人文经济。共同富裕作为价值旨归, 是人文经济与促进社会公平相连接的桥梁, 它既促进社会公平成为经济发展的内生诉求从而使经济成长为人文经济, 也引导人文经济促进社会公平。

四、结语

建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推动人文经济蓬勃发展是学界正在热烈讨论的重大课题。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新时代人文经济则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实践支撑。以伦理学视角观之,新时代人文经济具有极为丰厚的伦理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因此新时代人文经济也集中体现为经济与人文融合发展。经济与人文融合发展在伦理学上又体现为伦理与经济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因而从伦理学视角来理解新时代人文经济就是要阐释新时代人文经济的伦理含义。具体来说,这种伦理含义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一是新时代人文经济既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也以人文性、道德性来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因而新时代人文经济具有满足人的双重需要的伦理取向;二是新时代人文经济既坚持为人民负责,也坚持为未来负责,因而新时代人文经济以担当对人的责任为伦理选择;三是新时代人文经济既基于市场经济追求高效率为促进社会公平奠定基础,致力于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又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价值旨归,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质上就意味着社会公平,因而新时代人文经济以促进社会公平为伦理诉求。探讨、揭示新时代人文经济的伦理含义,能够帮助人们更为深刻地理解新时代人文经济的内在本质,有效促进人文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参考文献:

- [1] 罗卫东.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经济属性[J]. 浙江社会科学, 2025(1): 28-41.
- [2] 陈立旭. 理解人文经济[J]. 浙江学刊, 2024(6): 66-76.
- [3] 洪银兴. 人文经济学: 人文与经济相互促进共同繁荣[N]. 光明日报, 2025-07-22(11).
- [4] 樊浩. 人文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学”? [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1): 5-14.
- [5] 多亚尔, 高夫. 人的需要理论[M]. 汪淳波, 张宝莹,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 [6] 李建华. 类节制: 后物质主义时代的伦理觉悟[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4): 1-10.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27.
- [8] 王伟光. 利益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64.
- [9]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150.
- [10] 哈克. 新商业文明: 从利润到价值[M]. 吕莉,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144.
- [11] 黄海锋. 守正创新 融合赋能 杭州全力推动人文经济学市域实践[J]. 党建, 2025(2): 49-51.
- [12]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经济学研究课题组. 苏州奇迹的人文经济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5.
- [13] 甘绍平. 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M]. 贵阳: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9: 103.
- [14] 吴忠民. 中国现代化新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3: 106.
- [15]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438.
- [16] 洪银兴, 等. 人文经济学的江南模样[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5.
- [17] 桑德尔. 当下的幸福: 哲学家的美好生活指南[M]. 祝惠娇,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3: 162.
- [18] 甘绍平. 一种超越责任原则的风险伦理[J]. 哲学研究, 2014(9): 87-94.
- [19] 刘香檀, 郇庆治.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视域下的生态本体论及其现实意义[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3): 24-31.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 [21] 陈二厚, 董峻, 王宇, 等. 为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生态文明建设纪实[N]. 光明日报, 2015-03-10(1).
- [22]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72.
- [2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375.
- [24] 新华社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课题组.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23: 24.
- [25] 冯华, 李红梅, 寇江泽, 等.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念指引美丽中国建设[N].

人民日报, 2025-08-14(1).

- [26] 甘绍平. 伦理学的当代建构[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5: 70.
- [27] 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45.
- [28] 罗尔斯. 作为公平的正义[M]. 姚大志,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75-76.
-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36.
- [30] 米德克罗夫特. 市场的伦理[M]. 王首贞, 王巧贞,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18.
- [31] 奥肯. 平等与效率: 重大的抉择[M]. 王奔洲,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86.
- [32] 吴忠民. 论“共同富裕社会”的主要依据及内涵[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6): 83-92.
- [33] 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经济大省要挑大梁为全国发展大局作贡献[N]. 光明日报, 2025-03-06(1).

The triple ethical interpretation on the humanistic economy of the new era

GONG Tianping, WU Yinxia

(School of Philosophy,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a form of modernization characterized by the coordination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s.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two civilizations is centrally embodied the humanistic economy of the new era as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humanities. From an ethical perspective, this integration of humanities and economy is primarily reflected in the fusion of ethics and the economy. Consequently, the humanistic economy of the new era exhibits the following ethical significances: Firstly, humanities imply being people-oriented and satisfying human needs. And the humanistic economy of the new era not only meets people's material needs through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fulfills their spiritual needs through its humanistic and moral character. Thus, it possesses an ethical orientation toward satisfying the dual needs of humanities. Secondly, humanities entail shouldering responsibility for people. The humanistic economy of the new era adheres to being responsible for both the people of the present and for the future, making the assumption of this responsibility for humanities its ethical choice. Finally, humanities entail social fairness, justice, and a highly advanced civilization. The humanistic economy of the new era is grounded in the market economy, which pursues high efficiency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social fairness and strives for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Simultaneously, it is committed to the value goal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Sinc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inherently signifies social fairness, the humanistic economy in the new era takes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fairness as its ethical pursuit. Interpreting the ethical significances of the new era humanistic economy contributes to a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its intrinsic nature, effectively promotes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reates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every individual.

Key words: humanistic economy of the new era; dual needs; ethical responsibility; social equity

[编辑: 胡兴华]